

【研究討論】 Research Note

跨國界的歷史與東亞
——從日韓思想史的視域思考
Trans-national History and East Asia:
Perspective from Intellectual History of
Japan and Korea[§]

桂島宣弘

Nobuhiro KATSURAJIMA*

田世民**譯

§ 本文以題為〈トランスナショナル・ヒストリーという視座〉，發表於《新しい歴史学のために》，第277號（京都：京都民科歴史部會，2010年）的文章為基礎，將臺灣納入視域之中、大幅改寫而成。文中所使用的史料等全部譯為現代日語。（譯注：引文已全部譯為中文。）

* 日本立命館大學文學部教授。

Professor, College of Letters, Ritsumeikan University.

** 淡江大學日本語文學系助理教授。

Shih-Min TIEN, Assistant Professor of Japanese, Tamkang University.

壹、前言——何謂跨國界的歷史？

世界的全球化已喧騰多時。的確，在瞬息之間取得全世界的情報的時代已然來臨，我們可以透過網路等途徑輕而易舉地取得地球各地有關政治、經濟、文化的各種情報。但是，如何整理和理解這些情報的「尺度」本身（即使後國族主義〔post-nationalism〕相關的重要理論已有變化的徵兆）依然是以國民國家為單位，我們仍舊無法脫離以國族（歸屬的國籍）或國民語言等單位來觀察、思考這個世界。猶有甚者，經常目擊到的現象是：在自詡對地球史＝整體史的理解有重大影響的馬克思主義退潮的同時，所謂世界的全球理解終究無法超越比較國民文化的框架。而且，歸結到國民文化論的後果，反而通過「差異的確認」而更強化了本質還原論。

在這樣的情況之下，為了將歷史「開放」至全球，我現在最關注的是韓國近現代史研究者尹海東所提倡的「跨國界的歷史（transnational history）」這個概念。transnational history中的trans是一個包含across（橫跨）、beyond（超越）、through（貫通）等意思的接頭詞，「transnational 這個用語包括了橫跨國家的、超越國家的、貫通國家的等涵義」。因此，所謂的transnational history，可以說是「橫跨國家的、超越國家的、貫通國家的」歷史。摘引尹氏的說明如下：

人類的歷史、特別是近代世界體制的歷史，一直以來都僅以一國為單位作為前提來理解，這正是近代歷史學的重要屬性。但是，只要不具備有能夠超越國家、跨越國家之間的視野，就不能正確地掌握人類的歷史。發自這樣的自覺，我提出跨國界的歷史（transnational history）這個嘗試。要言之，所謂跨國界的歷史（transnational history）是為了超越一國史、作為代替方案的歷史而提出的概念。

（中略）這樣的觀念包含著下面幾個問題意識：第一，超越歐洲中

心主義的嘗試；第二，提出周邊相對於中心的問題；第三，超越國史（national history）的二分法觀點；第四，對地域史（regional history）之封閉性的顧慮等。可以說，跨國界的歷史（transnational history）超越近代歷史學基礎的一國史，而同時含括了一個問題意識，即克服歐洲中心主義、以周邊和弱勢為中心，從包含全地球的格局來重新理解歷史。並且，藉由將人類中心的歷史相對化而強化生態史方面的問題意識，在這點上也可以高度評價跨國界的歷史（transnational history）的意義。¹

暫且不論在歷史學上如何具體實踐的困難性，有關這個概念尹氏已做了明快的說明，無須贅述補充。其中，我特別關注的是，trans的意思當中through（貫通）＝「互換性」「共時性」這個部分。也就是說，藉此可以迴避經常附著在global history（全球歷史）或world history（世界歷史）等概念（即使其原本的意圖不在於此）上之國民史總合的誤解。此外，現今雖然分歧成為各式各樣的國民國家，作為一個概念，從過往曾經共同擁有的共時性結構來處理帝國＝領域的歷史、並掌握至近代為止的互換性歷史結構，這個transnational history是個極為有效的概念。如後所介紹的，具體而言，尹氏提出這個概念是作為掌握帝國日本的殖民地統治時代的視角（而且，這在曾經同為帝國日本殖民地的臺灣也是具有啟發性的論點），尹氏所提出的問題當然不限於近現代史。事實上，在韓國已有前近代史研究從這個跨國界的（transnational）觀點著手進行新的東亞研究。例如：有關豐臣秀吉的侵略朝鮮，近年在韓國已出現與過去的觀點完全不同的新研究。不用說，以往在韓國，豐臣秀吉侵略朝鮮（文祿、慶長之役）被稱為「壬辰倭亂」「丁酉倭亂」，將其視為日本國（或者是日本人）在帝國日

1 以上引自尹海東：〈トランスナショナル・ヒストリーの可能性〉，裴貴得（譯），《季刊日本思想史》，第76號（東京：べりかん社，2010年）。尹海東是韓國成均館大學教授，作為後述殖民地近代性論的論客，不僅韓國國內，在日本也很知名。主要著作有《殖民地的灰色地帶》（首爾：歷史批評社，2003年）、《殖民地近代的悖論》（首爾：Humanist，2007年）等。另外，嚴格來說，transnational history的概念是在進入二十一世紀，於韓國《Transtoria》《사오 trans 問》等雜誌刊行後開始受到矚目的概念，並不是尹海東的獨創。（再往上追溯的話，可以說是1990年代歐美人文學界的「越境史」、「越國史」等下層〔subaltern〕研究的影響開始及於韓國的歷史研究中所出現的概念，在此不深究。）

本侵略前的一個事態，證明其歷史的暴力性（野蠻性）。也就是說，在韓國，這個史實不但沒有被視為過去「遙遠的」事件，而將其與近代日本連結起來思考的看法，長期以來具有相當的影響力（就這個意義上說，它可以說是較殖民地統治的問題，日韓之間認識差異更大的事件）。但是，鄭杜熙、李璟珣、キム・ジャヒャン等「東亞戰爭史研究會」的成員卻將豐臣秀吉的侵略朝鮮稱為「壬辰戰爭」，將其定位在以十六世紀末東亞的動亂、女真族（之後的滿洲族）的崛起所象徵的東亞秩序大動亂之中。特別值得注意的是金翰奎的研究，金氏指出：「一直到二十世紀初傳統國家消滅為止，十世紀以後的東亞世界由在遼東崛起的一連串統一國家主導了東亞世界的秩序」，明代的遼東發生了「權力的空白狀態」，這正是導致女真族和豐臣秀吉等入侵的背景。²無可諱言，這是不將豐臣秀吉的侵略僅當作日韓兩國間的事件，而可以視其為「超越國家的境界、在東亞的國際舞臺上重新省察」之跨國界的（transnational）研究的正式登場。

由此可見，跨國界的歷史（transnational history）主要是發端於以往民族主義歷史學佔有壓倒性影響力的韓國。這是為什麼？各式各樣的原因所在多有，我個人較為關注的，是一九九〇年代後半以降，從後殖民問題相關的討論，提出了不再停留在日韓兩國關係的觀點，並且因此而引起了激烈論爭的這件事情。（後述）亦即，後現代主義研究、年鑑學派歷史學為首的新興歷史方法論在一九九〇年代以降的韓國格外醒目，特別是有關「殖民地近代」「近代性」，不限於日韓兩國關係的問題接二連三地出爐，這個動向劇烈地改變了韓國歷史學的情況。³對於這樣的動向，我們該如何應對？「從國民史到跨國界的歷史（transnational history）」這個課題必須突破理論性的工作，與這些實踐性的課題聯結起來才真正具有意義。⁴

2 以上引自鄭杜熙、李璟珣（編）：《壬申戰爭》，金文子（監譯），小幡倫裕（譯）（東京：明石書店，2008年）。金翰奎執筆第十章〈壬辰倭亂の國際的環境〉。此外，這樣的研究背後，也存在著中、韓之間圍繞著高句麗和遼東之極為政治性的歷史認識問題，不能毫無顧忌地給予肯定的評價。在此附帶說明一下。

3 韓國之歷史研究的劇烈變動、特別是關於殖民地時期朝鮮史研究，參見庵途由香：〈殖民地時期朝鮮史像をめぐる〉，《歷史學研究》，第868號（2010年）。

4 作為這種工作的一種嘗試，立命館大學與韓國高麗大學校日本研究中心之間，進行了重新檢討朝鮮總督府編纂的《朝鮮史》之共同研究。其成果已刊載於包含尹海東文在內的《季刊日本思想史》第76號的專刊號（「殖民地朝鮮における歴史編纂」）中，請參看。

當下我們面臨了一項刻不容緩的課題：為了與韓國（朝鮮）、還有中國、臺灣等東亞的人士，以歷史學（思想史學）為媒介，發展共同的研究活動，我們必須正視及發展跨國界的歷史（transnational history）。這一點吾人必須銘記在心。

貳、跳脫「鎖國」日本像與近世帝國論

（不用說近現代史）在古代史、中世史研究上，過去已進行過多次將日本史「開放」至東亞的嘗試。⁵就這個意義上說，最阻礙不前的是立足於「鎖國」像的日本近世史研究（以下，基於與韓國學界討論的實際情況，稱為「德川日本」）這個分野。但是，眾所周知，透過朝尾直弘、荒野泰典、藤田覺、Ronald P. Toby、池內敏等人在政治史、外交史研究上的進展，一九九〇年代以降，德川日本的「鎖國」像業已逐漸被打破。⁶當然，關於這一點，例如「鎖國」已被證明是志筑忠雄於一八〇一年摘譯 Engelbert Kaempfer（ケンペル）的《日本誌》時所使用的概念，亦即僅將其理解為一個軼聞；或是將用語轉換為德川幕府在十八世紀以降所使用的「海禁」。換言之，將「鎖國」的實態視為前提而改用「海禁」一語，以此來看待這個問題的傾向依然強烈。但是，質言之，以「鎖國」像來掌握德川日本的問題性，不外乎是在以統合為「近代世界體系」、「世界＝經濟」（不用說正是華勒斯坦 "Immanuel Wallerstein" 的概念）以後，來自歐洲的日本像來理解德川日本這點上。換言之，關鍵在於：以近代日本的脫亞式的眼光來看待德川日本，將導致存在於中華帝國的周邊、外緣的德川

5 當然，這方面我是外行，不過在中世史方面可以舉網野善彥、田中健夫、村井章介等人的研究為代表。另外，1990年代的《アジアのなかの日本史》系列（I～VI，東京：東京大學出版會）和《アジアから考える》系列（1～7，東京：東京大學出版會），在開拓一同掌握亞洲史和日本史的觀點這方面，可說是劃時代的研究。

6 例如：荒野泰典：《近世日本と東アジア》（東京：東京大學出版會，1988年）、Ronald P. Toby：《近世日本の国家形成と外交》，速水融、永積洋子、川勝平太（譯）東京：創文社，1990年）、《朝尾直弘著作集・5》（東京：岩波書店，2004年）、藤田覺：《近世後期政治史と対外關係》（東京：東京大學出版會，2005年）、池內敏：《大君外交と「武威」》（名古屋：名古屋大學出版會，2006年）、Ronald P. Toby：《「鎖国」という外交》（東京：小學館，2008年）等。

日本當時的國際性退居為背景，完全在與荷蘭、英國、葡萄牙、西班牙等歐洲的關係之中去論述「封閉的」德川日本的一國性、孤立性。

而且，這種理解方式之所以在學界沿襲下來，明顯地與過去的近代國史學（國史教育）有很大的關係。簡言之，眾所周知，近代日本國史學的建立是受到經驗科學之德國文獻學的影響。⁷將文獻學＝近代實證主義這看似「無思想」的方法（將其作如是觀的，正確來講應該是戰後的歷史學）採用為學問方法的這個時期，同時以國民史（民族史）、基於社會進化論發展史觀的時代區分、西洋中心史觀（Orientalism）、以及政治史事件為中心，「走私」了記述制度、社會、經濟、文化、風俗等的模式，這些在在使德川日本的「鎖國」像成為一個固定性的圖像。在此無法細述，奠定作為一國思想史學之日本思想史學的中心人物和辻哲郎，其《鎖國》一書長期以來立於定論的地位，就這個意義上來說亦非偶然。⁸

總之，近年所看到的跳脫「鎖國」日本像的動向，在將這近代國史學之脫亞的歷史像予以相對化、為己（für sich）化上面、以及前述重新思考跨國界的（transnational）德川日本上面，可以說都具有重要的意義。在思考跳脫「鎖國」日本像方面，我認為另一個有效的提議是山下範久的「近世帝國論」。山下批判華勒斯坦預測之「從世界＝帝國至資本主義世界、經濟」的近代世界體系的形成過程（「長期的十六世紀」以降的展開）無疑是單線的西洋中心史觀。相對於此，山下在「長期的十六世紀」後半期以降，設定了世界性的近世帝國（歐洲、俄羅斯帝國、奧斯曼帝國、蒙兀兒帝國、清帝國）的時代。簡言之，在經過十三至十五世紀全球規模之帝國的收縮、解體之後，經歷十六世紀的前半期、一般視為「大航海時代」之空間擴大的時代，應該在十六世紀後半期插入管理和制度化的階段，亦即「世界＝帝國與世界、經濟之中間過渡階段」。此時，「（引用者按：

7 關於蘭克（Leopold von Ranke）、李斯（Ludwig Riess）等德國近代歷史學的傳入日本，小島亮〈歴史学の終焉—制度的歴史学の崩壊によせて〉（收入 *Chubu Institute for Advanced Studies Forum Series*, 80〔春日井：中部大學中部高等學術研究所，2010年〕）一文，在德國哲學（黑格爾、黑格爾左派、經驗論等）的關聯下對此有非常明快的整理。當然，小島氏對於德國近代實證主義的傳入日本這個通說性的理解，提出雙重、三重意義的疑問，認為那是意識形態。

8 關於這一點，請參見拙作：《自他認識の思想史》（東京：有志舎，2008年）。

既往的) 帝國在各地域發揮空間秩序凝聚的向心力，而平行地形成理念式的『世界』」。換言之，共有與其說是實際的不如說是理念式的「帝國」的向心力，並在域內出現爭奪其向心力之普遍性的在地性，而確立了帝國的=在地的雙重標準，這就是近世帝國。山下的說明如下：

在「長期的十六世紀」的後半期，交通空間得到進一步的整理和序列化，在共有抽象層次的「中華」理念的同時，在實體的程度上，作為地域普遍性的中心、各自追求向心力的諸王朝間建立了相互依存的（乃至共謀的）緊張關係，使其產生將交通關係封閉於域內的傾向。⁹

附帶說明，山下的預測是：一八〇〇年前後近世帝國體制的「globality的中斷」發生之後，顯現出來的是成為「帝國不在」之國民國家的世界。¹⁰同時他將當下的「帝國化」（Toni Negri與Michael Hardt）¹¹也納入射程，關於全球化，他認為使「globality的中斷」這世界史上殊為例外的事態——在這意義下，我們同樣熟悉的國民國家體制（世界分割統治為一百五十個以上的國民國家的世界體制）也是一個例外的事態——終結的轉換仍在進行當中。如果將華勒斯坦的帝國概念置換為共有某種論述性的「普遍性」的空間，將主要共有國民國家式之「封閉性」理念的近代世界體制視為例外的事態，並且進一步將現代世界視為往共有「開放」的「普遍性」發展的進程，這個觀點在展望跨國界的歷史（transnational history）上面可以說饒富啟發性。

山下的近世帝國論與現在的近世東亞史研究所主張的論點大致吻合。例如：岸本美緒將十六世紀前後的變動期至十七、十八世紀視為「全世界

9 山下範久：《世界システム論で読む日本》（東京：講談社，2003年），頁124。

10 前掲書，第4章。

11 アントニオ・ネグリ（Toni Negri）、マイケル・ハート（Michael Hardt）：《帝國：グローバル化の世界秩序とマルチチュードの可能性》，水嶋一憲等（譯）（東京：以文社，2003年；原著刊於2000年）。關於此書與華勒斯坦的議論，參見山下範久（編）：《帝國論》（東京：講談社，2006年）。

來看同樣具有幾大特徵的時期」，並且依據Joseph Fletcher的說法提出以下幾個共時性的特徵：

- (1) 人口的增加
- (2) 歷史性節奏的加速化
- (3) 作為經濟活動中心之「地方」都市的成長
- (4) 都市商業階層的興起
- (5) 宗教的再興與宣教活動
- (6) 農村的騷動
- (7) 游牧民族的沒落

而且，她將這個時代視為「創造出與今日息息相關之國家的地理、民族框架」的關鍵時期，「各國具有特徵之制度和習慣的成立，即使與近代國家主義不同形式，仍伴隨著與他國對比之自我意識的強化」，在與「華夷觀的多元化」互相交錯的同時，形成作為後近代克服對象之「傳統社會」的時代。關於德川日本，岸本氏亦將其統一政權的成立視為「與多文化狀況引發的危機感互為表裡而進行的結果」，提出必須與東亞至東南亞之廣域範圍的動態共時性地來掌握的視角。¹²就我來看，岸本氏的說法正與山下所說的近世帝國概念不謀而合，兩者在思考跨國界的歷史（transnational history）方面都是富有啟發的主張。

再者，德川思想史（或者明清思想史、朝鮮思想史）的領域在鮮明且理念地揭示這近世帝國的共時世界性這一點上，值得重新再加以檢討。當然，在處理理念的思想世界裡，事態並不一定與實態並行不悖地進展。例如，十五世紀為止之明代冊封體制的興盛如果說體現了實態的明中華主義的話，其作為朱子學的理念而被廣泛接受，則必須說是在「東邊」的德川日本、特別是十七世紀前半期。但是，其實在文本上闡述世界圖像的思想家＝知識人那裡，可以更為顯著地看出與前述的「鎖國」像大異其趣的（跨國界的）「生活的世界」，這一點應該更加留意才是。因此，我想主

12 以上，參見岸本美緒：《東アジア・東南アジア伝統社会の形成》，收入《岩波講座世界歴史・13》（東京：岩波書店，1998年）。

張的是：德川思想史研究在思考跨國界的歷史（transnational history）的可能性時，是一個極為有效的「立足點」。以下，就這一點作簡單的陳述。

參、邁向跨國界的思想史

眾所周知，在戰後的德川思想史研究中最具壓倒性影響力的是丸山真男的《日本政治思想史研究》。¹³在今天，對丸山的批判已告一段落；一言以蔽之，丸山將博克瑙（Franz Borkenau）所謂從中世自然法至近代性思惟、所揭示之近代性思維的展開過程，沿著德川思想史內在地描繪出來，確實其近代主義、以及丸山個人也自我批判的脫亞性是一目了然的。關於這一點，誠如姜尚中指出：「地緣政治學的論述顯然是透過與『西洋』之假想的中心的比較，來表述作為同質性的『他者』的亞洲，同時也意味著，透過與其他亞洲國家做比較，將符合西洋秩序觀念之日本國民文化的特質凸顯出來，這樣的雙重操作。這些勢必都替自我論及式地強化日本的國民文化同一性之意識形態的再生產，填補了能量」；¹⁴子安宣邦指出：「丸山讀入了因公、私的分歧而獲致私的內面領域的自由、確立人為的國家觀等，關於具有『世界史式的課題』之『近代』的敘事，將徂徠的『解體』工作視為『分解過程』，從而建立了『思想史』的敘述」。¹⁵筆者也曾經指出：丸山關於引用黑格爾的「持續的帝國」之中國觀，乃至認為：「我們在歐洲的中世至近世的哲學史上，想起後期經院（Schola）哲學所扮演的角色」、「朱子學大致純粹且全面地具備了共同社區（Gemeinschaft）式的思惟」等說法，完全地繼承了井上哲次郎以來戰前期日本思想史學之一國史的結構。¹⁶

13 丸山真男：《日本政治思想史研究》（東京：東京大學出版會，1952年）。原發表於1940年至1942年、1944年的《國家學會雜誌》。

14 姜尚中：〈丸山真男における「国家理性」の問題〉，《歷史學研究》，第701號（1997年）。

15 子安宣邦：《「事件」としての徂徠学》（東京：青土社，1990年）。

16 前掲拙作：《自他認識の思想史》。

丸山主要關注的是德川日本思想史之一國思想史，這一點無庸置疑。但是，即使如此，還是必須承認朱子學的思惟的確是作為「儒教這原本承擔實用性格的思想，所能擁有空前而恐怕也是絕後之大規模的理論體系」這共時性的東亞世界＝近世帝國的思惟。也就是說，即便丸山的立場是歐洲中心主義的立場，他為討論的前提所做的，東亞全域所共有的朱子學、儒學思惟這個設定本身，值得我們以今天的觀點重新再加以探討。

例如：丸山對朱子學的一般性理解是「道學的合理主義、內含嚴格主義（rigorism）的自然主義、連續性思惟、靜的＝觀照傾向」，而評論藤原惺窩：「沒有超出朱子學說的忠實介紹一步」。丸山僅將惺窩看作是東亞性思維的單純「介紹者」。但是，我認為應該將這個現象理解為：惺窩對明朝、朝鮮、安南的「文化力」、（近世帝國＝中華世界之）共時性世界寄予了強烈的信賴。具體而言，惺窩以下的（兩者同樣聞名的）論述值得注意：

世界之所以是一個世界，是因為共有著性。以性來看，世界的差異僅是衣服言語之些微的歧異罷了。¹⁷

異域與日本雖風俗言語相異，天賦之理皆同。¹⁸

這裡面，充滿著惺窩對「性」、「天賦之理」的普遍性之無可動搖的確信。還有，他對因豐臣秀吉侵略朝鮮而遭俘虜來日的姜沆說：「我非生於中國、亦非朝鮮，而生於這終日陷於戰亂的日本，真是何等可惜啊！」¹⁹又傳說對弟子林羅山吐露心腹：「唉！不生於中國、也不是生於日本古代，卻是生於現代，真是多麼遺憾啊！」²⁰由此可知，惺窩受到眼中那近世帝國

17 見〈致書安南國人〉，《藤原惺窩集》（京都：思文閣出版，1978年；初刊是1941年），上冊，頁125，原漢文。

18 見〈舟中規約〉，前揭書，頁126，原漢文。

19 見《看羊錄》，與《睡隱集》合輯（首爾：民族文化推進會，1991年，影印《標點韓國文集叢刊》第73冊），頁120，原漢文。

20 見〈羅山先生文集〉，《林羅山文集》（大阪：弘文社，1930年），頁346，原漢文。

的文化中心（中華）的中國、朝鮮強烈的吸引。相反地，姜沆高度地評價惺窩也與這一點息息相關。

就共時性這一點來說，有必要提一下姜沆。眾所周知，姜沆是朝鮮王朝十六世紀末至十七世紀初期的著名朱子學者。姜氏曾師事畿湖學派（西人派）的重鎮成渾，而畿湖學派如所周知乃是繼承李珥（栗谷）的流派，在十六世紀後半與繼承李滉（退溪）的嶺南學派（東人派）互相對立。十六世紀前半的朝鮮王朝，士林派成功掌握王朝要路，朱子學奠定了朝鮮王朝體制教學的地位，但也同時導致拘泥於現實政治路線的黨爭日益激烈，畿湖學派與嶺南學派的對立即是其最早的例子。²¹關於成渾，在學派內部，與李珥進行長達六年的理氣論爭（「四七理氣論爭」²²），相對於李珥「氣發理乘」之主氣的立場，乃持主理的立場。德川王朝的知識人從「東邊」接受的朱子學，並不僅止於閻齋學派與嶺南學派之間的關係，²³自惺窩與姜沆以來，對於當時期的知識人來說，是極為常識性地視其為共時性的對象。

再者，所謂近世帝國，是在共有理念性的「帝國」向心力的同時，在域內出現了爭奪向心力的普遍性之在地性，確立了雙重標準的階段（山

21 如同李泰鎮所指出的（《朝鮮王朝社会と儒教》，六反田豊〔譯〕〔東京：法政大出版局，2000年〕），將這些黨爭視為無意義的爭論，並刻畫出彷彿那就是朝鮮朱子學的特性、甚或朝鮮王朝的屬性，不得不說殖民地時代日本方面的史觀發揮了很大的作用。李氏進一步釐清：士林派體現了與古代的貴族階層針鋒相對而成長的中小地主層的利害關係、並成功地掌握權力，顯示朝鮮王朝已奠定了近世的社會；在那裡，獲得正統教學地位的朱子學＝性理學，是否定權力的偏頗、以道學的政治為目標的。在內部的形上學爭論裡面，確實是有所弊害，但是在基礎上存在著圍繞現實政治路線的分歧（在與門閥貴族階層的關連上來說，最強烈主張排斥氣的東人派南冥學是與其互相對決的關係，中間夾著李滉，理通氣局論的李珥、理氣一發論的成渾則是現狀妥協的），毋寧是互補的關係。在這裡重要的是，將朝鮮朱子學的種種樣態放在與近世社會的成立的關連上來掌握的這個觀點。在地方社會上鞏固經濟基礎的新興勢力，試圖以共時性的理想來表現自己、並佔有王朝的一翼，應該視為該時期東亞思想史最基本的動態。關於這一點，亦參見前掲岸本美緒：《東アジア・東南アジア伝統社会の形成》。

22 這個論爭是直接承繼了李滉和奇大升之間的「四端七情論爭」，兩者都是現在韓國作為歷史知識最為人所知的論爭。李滉認為「四端理發而氣隨之」「七情氣發而理乘之」，在理氣二元論上持主理派的立場。關於這些論爭，詳參裴宗鎬：《韓國儒學史》，川原秀城（譯）（東京：知泉書館，2007年）。

23 阿部吉雄：《日本朱子学と朝鮮》（東京：東京大學出版會，1965年）。

下)，與「華夷觀的多元化」交錯、形成「傳統社會」的時代（岸本）；對於「華夷觀的多元化」=在地性造成決定性影響的，無疑是歷時百年動亂的明清王朝交替（「華夷變態」）。具體而言，在朝鮮王朝，因為一六二七年的丁卯胡亂、一六三六年的丙子胡亂，朝鮮小中華思想之自我意識幾乎在整個十七世紀已超越學派、成為一般性的意識。例如：因一六二三年的仁祖反正而掌握政權的西人派老論系的代表性知識人宋時烈的北伐論，即是這「華夷變態」後小中華思想的代表，主張以繼承明朝嫡統的小中華、禮儀之邦來討伐清國的「春秋大義」。²⁴在這裡，中華的概念與地域無關；尤其，認為建立在箕子以來傳統的朝鮮，在禮、文方面是屬於中華的這個意識值得留意。還有，在認清現實上已難打敗清國的十八世紀，這個朝鮮小中華思想更轉向發展出視朝鮮為唯一中華的朝鮮中華主義。具體來說，這樣的主張顯著出現在同屬西人派之少論系的今若行、李鍾徽等人的言論上。當然，另一方面，出現了老論洛論系的北學論，或是學派雖異、在南人系和近畿南人系（實學系）裡，也開始興起清國肯定論、西學研究等，包含在野不容忽視也存在著多樣的論述。但是，儘管迂迴曲折，在朝鮮王朝的廟堂裡持續造成重大影響的，仍是老論、少論系的朝鮮中華主義，特別是到了對西歐的危機意識趨於顯著的十九世紀，老論系的論述再度強化了起來。²⁵

這些朝鮮王朝的思想動向，乍看之下似乎是強調朝鮮中華主義之排他式的獨特性，但那種獨特性的強調實實在在是跨國界的（transnational）與德川思想史的轉向處於共振的關係。在此無法詳論，不過值得注意的是，經過「華夷變態」，由山崎闇齋、淺見綱齋等人提出了基於「自國=中國」論的日本型華夷思想，而對理念性文化性的自他認識造成微妙的變化。之後，到了十八世紀，發展出垂加神道等主張的日本中華主義，²⁶再加上對太宰春台《辨道書》的反駁，對徂徠流的「作為」提出異議，同時讚

24 見〈卷五封事〉，《宋子大全》，收入首爾大國史學科（編）《韓國思想史資料選集》（首爾：亞細亞文化社，1982年），頁314-330，原漢文。

25 以上參見河宇鳳：《朝鮮実学者の見た近世日本》，井上厚史（譯）（東京：ペリカン社，2001年）、河宇鳳：《朝鮮王朝時代の世界観と日本認識》（東京：明石書店，2008年）。

26 谷泰山、佐佐木高成、跡部良顯、伴部安崇、若林強齋等。

揚「自然」「自然而然（おのづから）」的日本等論述開始遍地開花。我們必須說：荷田春滿、賀茂真淵、乃至本居宣長國學式論述的出現，都與這樣的思潮脫不了關係。²⁷

從日朝相互的他者認識這個觀點來看，這些朝鮮中華主義、日本中華主義等主張，在某種意義上既然視自己為中華、小中華，必然將強化視為他者的日本、朝鮮較自己在文化上居於劣勢的意識。眾所周知，受到豐臣秀吉侵略的朝鮮方面可以看到多數如此看待日本的論述。另一方面，在此不可忽視的是，既然在根柢存在著共時性的意識，（如同前述的姜沆一樣）也有德川日本的儒者受到讚揚的情形。例如：著作《黑齒列傳》的許穆讚揚德川幕府求取儒書的事態為「蠻夷的盛事」，²⁸另外以著作《東史綱目》聞名的安鼎福也從儒學的言行讚揚山崎闇齋學派和伊藤仁齋。²⁹在德川日本方面，日本型華夷思想裡也可看到將日本較朝鮮列於優越地位的論述。但是，在此如就其認識框架本身來看的話，例如在日本型華夷思想的影響下的雨森芳洲那裡，存在著不受「國境」、「人種」侷限之共時性普遍主義的想法。或者，特別擔任與朝鮮人士「交鄰」之職的芳洲，曾指出：「為與朝鮮交流，知曉人情事勢殊為緊要」，特別留意具體「日本與朝鮮」之間「諸事風儀」的差異。還有，他說：「豐臣家進行不當的朝鮮侵略，在兩國無數的人民遭到殺害，這絕對不是可以自傲的事，反而顯示了我國的不學無識」，否定了豐臣秀吉的朝鮮侵略，這點是值得大書特書的。³⁰這些都是顯示德川日本儒者當時穩健的朝鮮觀的貴重史料，乍看似乎過剩的相互「蔑視」，是建立在如此近世帝國內的跨國界的（transnational）普遍主義之上，可以說其中存在著與近代國家主義完全相異的相互認識特質。

27 拙作：《思想史の十九世紀：「他者」としての徳川日本》（東京：ぺりかん社，1999年）。

28 前掲《韓国思想史資料選集》，頁332，原漢文。

29 安鼎福：《順庵先生文集》，收入《國譯順庵集（三）》（首爾：民族文化推進會，1996年），卷13，頁15，原漢文。

30 見《交鄰提醒》，收入《雨森芳洲全書（三）》（吹田：關西大學東西學術研究所，1979年，關西大學東西學術研究所資料集刊11-3），頁53。

如同山下氏所指出的，我們必須留意，在近世帝國，普遍性之中理念性的傾向相當濃厚，在實態上已有個別性逐漸成形。有關這一點尚未能具體言及，且丸山真男的議論在這點上也有必要再重新加以檢討。亦即，丸山所謂的朱子學至徂徠學、國學的分解過程，有必要將其視為「東邊」的思惟構造的轉變過程，當作東亞共時性中發生的分解過程的一個場面來重新思考。清朝之儒教、朱子學的機能主義式的轉向與考證學的成立、朝鮮之正統意識的轉變等，雖有深淺之別，但都可將其視為與德川日本的朱子學分解連動的、近世帝國普遍性的分解過程。「全球性（globality）的中斷」（山下）為這樣作為同心圓世界的近世帝國帶來什麼樣的共時性近代？這是與這個分解過程的地域性偏差密切相關的問題，將是今後德川思想史研究的重要課題。

肆、結語——殖民地近代性論的追問

如前所述，跨國界的歷史（transnational history）是尹海東所提倡的概念，這是有關韓國圍繞殖民地近代和近代之劇烈變動而論爭性地提出的概念。最後，談一下與其變動相關的殖民地近代性論，再次思考包含臺灣在內之跨國界的歷史（transnational history）的可能性。

再次重申，在韓國所謂民族主義的歷史學一直以來佔據了壓倒性的影響力。如果考慮到戰後韓國（和日韓關係、或者與臺灣的關係）的歷史發展，這一點是可以理解的。對於經歷了帝國日本的殖民地統治、被剝奪了自己記述歷史的權利的人來說，找回自己民族的歷史、將其建構為一個民族史、國民史，是殊為緊要的課題。尤其，殖民地時期日本方面的歷史編纂和歷史記述，視其為根據「他律性史觀」、「停滯性史觀」、「日鮮同祖論」的「殖民史學」而遭到嚴厲的批判，與之對決而急欲建構自律的、發展史式的民族史。³¹又加上戰後日本對殖民地統治的「過去清算」毫不徹

31 姜萬吉：〈近現代韓日關係研究史〉，《日韓歷史共同研究委員會第I期報告書》（日韓文化交流基金網站，2002-2005年）。

底，甚至惱羞成怒似的發言不斷在日本上演。由此推之，我們不得不說：民族主義的歷史學在告發帝國日本的罪行、進而樹立自律的國民國家已成為重要課題的階段，一直扮演著重要的角色，並且延續至今。（因此，國民史＝一國史不應以一般論來批判它。³²）

對於這樣的民族主義歷史學，提倡跨國界的歷史（transnational history）的尹海東等人提出殖民地近代性論的議論，正面地給予批判。一言以蔽之，殖民地近代性論是將連接至現代的近代，視為以世界史上的西歐近代為中心的「殖民地近代」之霸權化的時代，而將日本的殖民地統治也配置在那個過程之中。借尹氏的話來說，這個議論是要「從殖民地將西歐近代對象化」並加以批判，換言之，是要抉剔作為「應該內在化於殖民地本身之中的外部」的西歐近代，最終以揚棄歸結到跪拜西歐近代之「一國史論的近代化論（被稱為「新右翼（New-Right）」）、以及民族主義歷史學（被稱為「掠奪論」）這兩者為目的。³³當然，三者現在仍持續激烈論爭中，在此特別要指出來的是，這個殖民地近代性論是從跨國界的（transnational）立場提出來的。但是，這一點實際上並不被理解，因此與既有的近代化論混為一談而遭受批判。³⁴例如，尹氏指出：近代化論為了證明殖民地時代的經濟成長，強調自立的市場所達到的殖民地工業化以作為近代化的指標；³⁵這種論調完全低估了殖民地受到本國的強烈控制，經濟主體的內部存在著歧視、分割，是個不完全的市場這個事實。也就是說，尹氏認為問題在於：無視於殖民地市場是與歧視性、階層性世界市場連動而

32 徐京植：《分断を生きる：「在日」を超えて》（東京：影書房，1997年）。

33 尹海東：〈殖民地近代と大衆社会の登場〉，收入宮嶋博史等（編）《殖民地近代の視座》（東京：岩波書店，2004年）。

34 《歷史學研究》第867號（2010年）之編輯委員會對於「殖民地近代（性）論」的理解，看起來也是強調「近代性」的議論，完全忽視了transnational的面向。

35 韓國近年的殖民地近代化論以首爾大學校落星堊經濟研究所的研究為代表，最近介紹到日本的有李榮薰：《大韓民国の物語：韓國の「国史」教科書を書き換えよ》（東京：文藝春秋，2009年）。須川英德對李榮薰的議論視為與民族主義歷史觀對決的論著，給予好意的介紹，見〈書評〉，《新しい歴史学のために》，第276號（2010年）。的確，廣泛認為李氏在所謂近代化論者中是實證精密度最高的論者。但是，尹海東對於李氏作為民族主義批判的議論給予一定評價的同時，也強烈批判他經濟還原論的傾向、還有最嚴重的一國主義傾向，見〈應該如何看待韓國近現代史論爭？〉，《新東亞》，第569號（2007年，首爾）。

展開的事實，如此一國史的理解導致了這種經濟上數量的「誤讀」，而其所部署的帝國、以及與世界經濟的構造性關聯幾乎都被拋諸腦後。（附帶一提，有別於韓國方面有這樣的主張，日本方面如傳遞這樣的內容，無疑就是對殖民地統治不知悔改的反動言論。）另外，在民族主義「掠奪」論方面，強烈主張因殖民地時代政治、社會權利的限制而造成的經濟不平等＝掠奪，否定自立的市場已然形成的說法。

相對於此，殖民地近代性論是以殖民地日常性的掠奪為前提，強調近代性與歧視是同時顯現的，在這意義上是在世界體制之中相互關連而形成的共時性現象的一環。尹氏對這一點作如下的說明：

一方面將近代國民國家、或是市民社會的形成，另一方面將近代化的經濟成長設定為近代性的指標，全是出自一國史的近代性的解釋。因此，兩者（引用者按：「掠奪」論與近代化論這兩者）皆無法脫離近代至上主義。如此一來，兩者雖共有近代化的進步這樣的歷史觀，「掠奪論」則回顧過去、「殖民地近代化論」則不當地追認現在，都淪於過度的解釋。

西歐與殖民地呈現了同時顯現之近代性的多樣曲折，近代已經不是可以與特定地緣政治學上的位置結合思考的主題。（中略）所有的近代當然都是殖民地近代。（中略）這不會依循社會進化論式文明論的發展階段論，而將殖民地定位在低階的位置。（中略）這樣的認知不是將殖民地當作一國的、自足的政治—經濟—社會的單位，而是將其視為帝國的一部分，帝國與殖民地構成著一個相互作用的「關連的世界」，並從這樣的觀點出發。（中略）「殖民地近代論」同時擁有貫穿帝國與殖民地的共時性、以及聯繫殖民地與後期殖民地的通時性。另一方面，殖民地也具有掠奪與文明化—開發的

兩面性。總之，殖民地近代的問題意識是位於近代的兩義性與殖民的兩義性交錯的地點上。³⁶

如引文所述，在此尹氏所強調的是，殖民地統治的帝國與殖民地之共時性（「關連的世界」）的問題。尹氏的主張是：暴露在帝國壓倒性的優越性與掠奪之下、遭受歧視的殖民地，絕對不是個別單獨的存在，而是正以這兩者作為近代性、資本主義近代不可或缺的構成要素所凸顯出來的問題，並且作為延續至今的「後期殖民地」的問題、亦可說是應該跨國界地來思考的問題而存在著的。

以上，以尹海東的議論為中心探討了跨國界的歷史（transnational history）的可能性。但是，對於熟悉近代歷史學的人來說，從跨國界的（transnational）觀點來記述歷史絕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所謂近代歷史學，是指「史料蒐集→選擇→觀察→注釋、記號化、排列、解說」之一連串的作業，亦即根據近代實證主義的方法而建構的國民史＝一國史的記述模式。實證主義的方法雖然會被前景化、為己（für sich）化，但後者也就是「國民史的記述模式」要被為己化卻極為困難。毋寧說，民族的、國家的、政治的框架、發展史式的時代區分等，一方面成為史料配置的「基底」＝框架而變成背景，前者的實證性將那些框架「固定在歷史資料中」而變得理所當然，如此一來幾乎將很難被為己化。³⁷因此，要進行跨國界的（transnational）歷史記述，非得同時進行重新檢討後設層次的（meta-level）框架的工作才行。³⁸

36 前掲〈トランスナショナル・ヒストリーの可能性〉。

37 酒井直樹：《死産される日本語・日本人：「日本」の歴史一地政的配置》（東京：新曜社，1996年）。

38 在這裡立刻想到的是，作為戰後歷史學的鉅型理論（grand theory）、展現過影響力的諸種馬克思主義，當然曾經以這個後設層次的（meta-level）框架存在過。在與近代實證主義緊密結合的馬克思主義，一段時期曾將框架的理所當然化逆向操作而主張自己框架的優越性，現在則可說是顯示實證主義難以探討後設層次框架的一個好例子。當然，這裡所指出的，與追問馬克思主義是否正確，完全是不同的問題。慎重起見，補充說明如上。

為了進行重新檢討的工作，本文最想強調的是：必須與韓國、中國、臺灣等東亞地區的人士、研究者積極地累積共同研究。當然，這樣的工作已經在各種場面啟動，也獲得了若干重要的成果。但是，如要進一步地向前推進，超越自國史之間的對照、進行跨國界的（transnational）視角的轉換是所在必至的課題。現在韓國的人士所強烈要求的正是這樣的事情。